

第三章 改革開放與中共執政

第一節 經社發展與市民社會（公共領域）雛形的建立

改革開放，對中共與中國大陸而言，都是劃時代的大事。當鄧小平決定要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並將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後，解放經濟生產力成為全中國的共同目標，至今未變，中共一系列的政、經佈局與社會動員都為這條路線在服務。而八〇年代的中國，就在「好貓論」、「摸著石頭過河」、「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三步走」等思維引導下，開始闢出一條與過去毛主席歷史下迥然不同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毛時期的政治內耗，讓中國大陸浪費了三十年時間，而改革開放的前十年，又夾雜在制度摸索與心態調整的兩難之中，導致國家、社會都產生適應不良情況，八〇年代兩次大規模的學潮和社會抗爭，都是在這種氛圍下出現。及至江澤民主政的十三年，中國大陸內部政治相對穩定，為其經濟建設闢建了一個較好的格局。「十四大」所倡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讓中國的經濟規模開始大幅起飛；而「十五大」上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提供了國家對於市場的宏觀調控、以及對資源配置的有力法源基礎。

前述表 1-1 的統計即說明，九〇年代以來大陸人民對於經濟成長的期待，連帶引發出經濟與社會穩定相互關係的評價程度都是最高的，易言之，經濟因素在江澤民主政期間所扮演的正面角色，既給中共帶來了加分的效果，更是中共引為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基礎來源。更進一步，由表 3-1 可知，九〇年代後中共在經濟上的發展表現相當可觀，無論是國內生產總值 GDP、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規模，每一個項目的增長都在 4 倍以上，尤其是國民經濟的儲蓄部份更高達 11 倍，中國大陸成為全世界儲蓄率最高的國家。而圖 3-1 至 3-4，也同樣顯示出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趨勢，「保八」、「保七」的成長率口號不絕於耳，而中共也確實達成。¹尤其在「十五大」之後，大陸經濟發展並未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嚴重影響，中共

¹ 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統計，中國大陸自 1997 至 2001 年，每一年的經濟成長率均在百分之七至八之間，成為世界上表現最好的國家。見世界銀行網站，

反以「十五計畫」為手段，意欲擘劃出「十六大」上接襲的未來二十年總目標：建設小康社會。這種總體與個體經濟相互搭配的成長，突顯出社會經濟分化的程度，快於市場機制有效整合的速度，在市場與契約社會之間的紐帶尚未成熟的條件下，提供了國家權威資源，並使國家得以利用這種資源強化指令貫徹的機制。

2

表 3-1 1990-2002 年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成長比較
(1990、1992、1997、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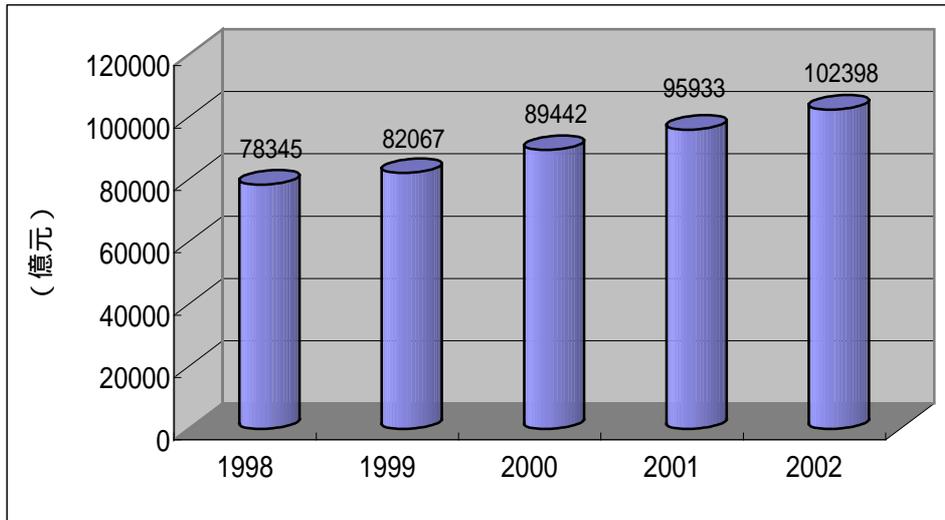
年 度 項 目	1990	1992	1997	2002	增長倍數 (1990-2002)
國內生產總值 (億元人民幣)	17400	23938	74772	102398	4.88
固定資產投資 (億元人民幣)	4451	7582	25300	43202	8.70
進出口規模 (億元美元)	1154	1656	3251	6208	4.37
儲蓄規模 (億元人民幣)	7034	11545	46280	86911	11.35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http://www.stats.gov.cn>

<http://www.worldbank.org.cn/English/content/cas03.pdf>。

² 蕭功秦，*歷史拒絕浪漫*（台北：致良出版社，民國 87 年 11 月），頁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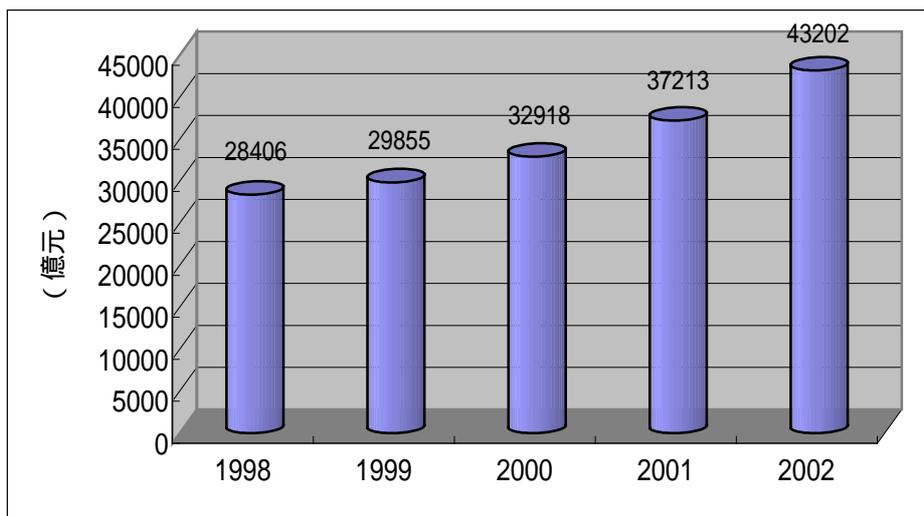
圖 3-1 1998-2002 年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1200302280214.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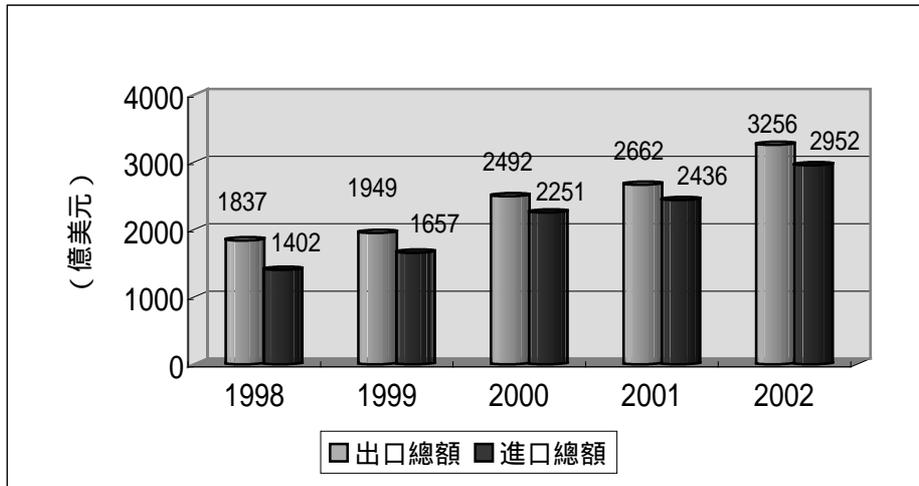
圖 3-2 1998-2002 年中國大陸固定資產投資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1200302280214.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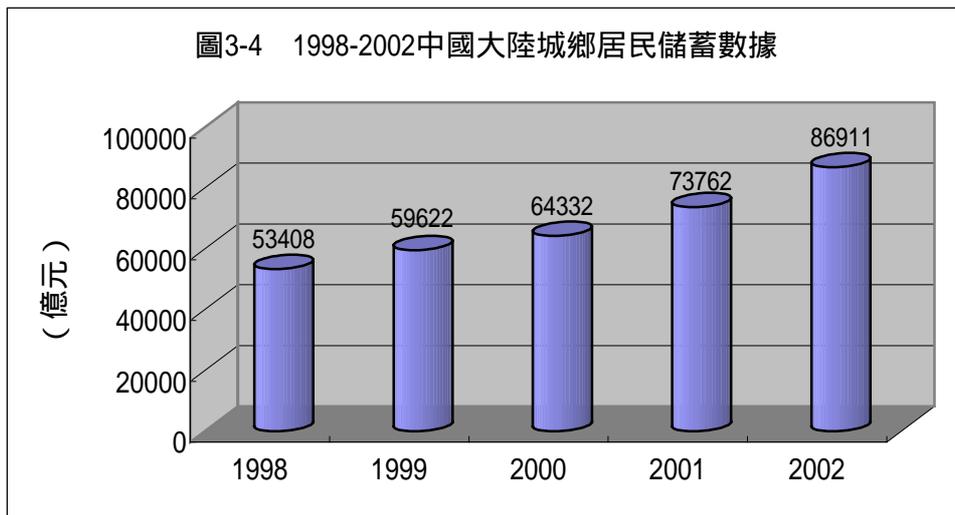
圖 3-3 1998-2002 中國大陸外貿進出口數據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1200302280214.htm>

圖 3-4 1998-2002 中國大陸城鄉居民儲蓄數據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1200302280214.htm>

隨著全球化浪潮逐漸興盛，中共不能避免地也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既要「引進來」又要「走出去」，中共認為缺一不可；江澤民在「十五屆二中全會」上即表示：「現在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聯繫日益緊密，相互影響越來越大，誰也不可能關起門來搞現代化建設，不可能迴避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和激烈複雜的國際競爭。」³尤其是中共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進入世貿組織，成為第143個會員國後，更強化了這樣的觀點，江澤民在「十六大」上強調「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拓寬發展空間，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⁴的基本認知，即已鋪陳出中共的「積極參與」戰略部署。因為中共體會到唯有積極參與，才能符合其國家利益，特別是中共自認其日趨堅強的經濟實力，是積極參與的有力後盾，如此始能在國際舞台上更加站穩腳跟。這種積極參與的主要附加效果，來自於外國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信心和逐漸增加的資金流入。我們從表3-2可知，九〇年代之後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的總額，均佔中國大陸國民生產總值GNP的三至四成；而表3-3則顯示出，1994年後外資進入中國大陸的額度達到4-6百億美元，使中國僅次於美國成為接受外資世界第二高順位的國家。當然，中共經濟戰略的重要標的之一，亦即利用對外接觸合作的機會，彌補其內需市場與整體發展最為脆弱的兩個環節：以吸收大量海外資金方式，既提供大陸增需的增長投資，也引進先進的管理和技術。⁵

改革開放致力於經濟發展的同時，中共也極為擔心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所進行的「和平演變」，以及內部社會因為「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後所造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效應。特別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成為中共撤換胡耀邦、趙紫陽兩位總書記的政治緣由，鄧小平當時即曾表示：「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要實行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

³ 江澤民，「做好國內經濟工作，增強承受和抵禦風險的能力」，**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頁204。

⁴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39.htm。

⁵ 童振源，**全球化下的兩岸經濟關係**（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2月），頁246。

表 3-2 九〇年代對外貿易占中國大陸經濟比重（1991-1999）

項 目 年 份	商品貿易占 GNP 百分比	服務貿易占 GNP 百分比	商品和服務貿易 占 GNP 百分比
1991	31.3	2.8	34.2
1994	39.5	6.0	45.4
1997	35.9	5.8	41.7
1999	36.4	5.6	41.9

資料來源： *International Statistics Yearbook*.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0.

表 3-3 中國大陸接受外資情形

單位：億美元

年 份 項 目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國外直接投資	338	375	417	453	455	403	407
國外貸款	93	103	127	120	110	102	100
其他外資	2	3	4	71	21	18	86
全部流入資本	432	481	548	644	586	527	594
外債	928	1066	1163	1310	1460	1518	1457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編，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001年8月（108期）

共產黨內也有。」⁶江澤民則指出：「全球信息化的發展，有利於國際信息的交流和溝通，但有些西方國家正在利用這一點向發展中國家輸出西方式的『人權』、『民主』觀念，企圖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內部事務。」鄧、江的憂慮，隨著「十四大」揭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更加突顯，因為這個前所未有的轉變，為中國大陸帶來了社會經濟成分、社會組織形態、物質利益與分配形式、就業方式、生產和生活方式等面向的多樣化趨勢；而社會組織的多樣化，使得行政命令手段大打折扣，中共的黨組織和政府不能完全發揮過去的指揮管理效果，甚至造成黨和社會之間的矛盾。⁷

研究中國大陸多年的奧森柏格，提出了這樣的觀察：過去二十年的中國大陸社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牽引著中國政治體制往以下四個方向演進：

一、從農業所主導的經濟體系向工業轉化，從農村向城市社會轉化。

二、從指令性計畫經濟向國家高度調控的市場經濟體系轉化，從列寧主義的政治體制向某種型式的極權體制或是民主體制過渡。

三、經濟的迅猛發展產生了一個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這個階級為保護個人利益，將會要求參與政治決策，甚至掌握更多的信息，作為分析政治局勢、組織政治行動的交流手段。

四、出身於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新一代領導人，將取代老一代共產主義革命家接掌政權。⁸

吳玉山教授則從現代化理論與政權穩定理論角度出發觀察中國大陸，認為：

「威權政體的合法性在經濟改革的過程當中，先是如政權穩定論所預測的上升，然後會如現代化理論所預測的下降，和此一現象對應的是社會對於民主的需求（包括內在性的需求和工具性的需求）會先下降，然後

⁶ 鄧小平，「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頁123-124。

⁷ 王長江，**現代政黨執政規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頁97-99。

⁸ 原作者為Michel Oksenberg，收錄在胡鞍鋼編，**中國走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頁239-240。

再上升，因而形成一個「U」型的上凹曲線。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是就長期而言，現代化和經濟結構的變動帶來了內在性的民主需求，而經濟成長的趨緩也提升了工具性的民主需求。」⁹

從大陸學者眼中的社會組織多樣化，奧森伯格所稱的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趨向，特別是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的出現，以及吳玉山教授強調經濟成長與民主需求的關連性綜合看來，儼然導引出一個可資討論的命題：這樣的經濟發展軌跡，是否可以為大陸的社會發展，帶來形塑「市民社會」的前導動力？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經改革與社會變遷，究竟中國大陸是否已經有了「市民社會」的存在？它對中共的執政效能，會產生何種影響？

有關市民社會的討論可謂多如牛毛，本文不擬贅述。而自從哈伯瑪斯將 Civil Society 視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之後，頓時讓市民社會的解讀面向更形寬廣。至於中國大陸社會是朝向 Civil Society 還是 Public Sphere 發展，學者各有爭論。¹⁰惟蘇紹智、麥康勉 (Barrett L. McCormick)、蕭曉明 (Xiao Xiaoming) 等人認為，經濟改革已經開始腐蝕中共利用國家對社會進行的嚴峻控制，由自發性組織、企業活動和自發性的公共討論所形成的市民社會場域，很清楚地已在當前的中國內部出現。¹¹麥德遜 (Richard Madsen) 認為，因於改革而使得中國社會中很大一部分的組織產生了興起或翻轉現象，至少這些組織已經能夠從國家的控制中找到若干自主的領域。¹²賈西津指出，隨著中國體制改革的深化，確實出現了與政治和市場機制所不同的社會空間，並在逐漸擴展，這個改革是一個「總體性社會」的全能型「國家」逐漸退出市場和社會領域的過程，或曰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重塑過程。¹³其他如歌德 (Thomas B. Gold)、奧斯特格 (Clemens S. Ostergaard) 等亦持

⁹ 吳玉山，「現代化理論 vs. 政權穩定論：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前景」，**政治科學論叢**，第 9 期（民國 87 年 6 月），頁 443。

¹⁰ 例如，*Modern China* 即曾經以中國究竟有無市民社會，以及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主題，刊載過專題，包括 Richard Madsen,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Heath B. Chamberlain,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Philip C. C. Huang,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Mary Backus Rankin, "Some 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Modern China*, Vol 19 No.2, April 1993.

¹¹ *Pacific Affairs*, 65, No.2, Summer 1992, pp.182-202.

¹² Richard Madsen,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Modern China*, Vol 19 No.2, April 1993, p.189.

¹³ 賈西津，「發展中的中國公民社會」，**中國評論**（2003 年 9 月號），頁 30。

相近論點，認為中國已經出現了市民社會。¹⁴

相反地，趙穗生指出，雖然國家權力正在衰退而社會意識與空間不斷增加，但這些改變並不足以證明中國大陸有市民社會的存在，原因在於中國的社會並不具備組合社會力量以對抗國家機器的能力。¹⁵而王紹光指出，七〇年代以來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大幅膨脹，民間組織亦頗多增加，但獨立工會、學生組織等仍是觸碰不得的禁區，更遑論政治反對組織。因此，不能說中國大陸已出現嚴格意義上的市民社會，但也不能否認市民社會的成分已大大增加。¹⁶黃宗智更嚴格地認為，八〇年代中國經濟的市場化，伴隨著中國政治生活的開放與民間社團的相應興起，但如果就此將市民社會（黃使用「公民社會」一詞）套用在中國現狀，就會造成相同複合體也在中國出現的錯覺，因此，他以「沒有公民社會的市場化」來形容當前的中國大陸。此外，¹⁷華爾德（Andrew World）則堅持以「體制內的多元性」而非市民社會已經形成的觀點來看待大陸社會。¹⁸美國學者偉勒（Robert P.Weller）另行提出「Alternate Civility」來代替市民社會，他認為市民社會在非西方地區存在著適用性問題，而 Alternate Civility 指的是介於國家和家庭之間，根植於草根階層的協會或社團，這可能是中國大陸民主轉型的根源。偉勒強調這些協會或社團是鑲嵌在市場關係內，且在國家控制擁下擁有自由空間，而這些團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可進一步轉化成行動或正式組織，即使威權國家也不可能完全滲透這些協會或社團，這雖然無法為中國的民主化提供保證，但卻可能直接挑戰共黨國家的核心價值。¹⁹

將上述論點鋪陳開來，我們可以發現：隨著市場經濟的催生，扭轉了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傳統公、私觀念，開始承認個人追求利益的正當性，而這種個人利益

¹⁴ Thomas B. Gold, "The Resu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0, No. 1, pp. 18-31. Clemens S. Ostergaard, "Citizens, Groups, and a Nascent Civil Society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1989, No. 4(2), pp. 28-41.

¹⁵ Zhao Suisheng,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Reform on the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Zhishifenzi*, winter 1992, pp. 21-26.

¹⁶ 王紹光，「破除對 Civil Society 的迷思」，周雪光主編，**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11月），頁25。

¹⁷ 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3、34。

¹⁸ Andrew World, "Worker, Managers, and the State: The Reform Era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1989," *The China Quarterly*, 1991, No. 127, pp. 467-492.

¹⁹ Robert P. Weller, "Alternate Civilities: Democracy and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171, September 2002, pp. 741-779.

正當性的追求，反轉過來正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²⁰假若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理論為真，那麼中國大陸過去二十餘年的經濟發展，將可以為理應構置在上層建築的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創造些許條件。筆者同意，目前的中國大陸在社會民間組織和輿論空間上，雖然已較改革開放初期有相當的擴充，但是在中共「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一起抓」、強調集體主義不放鬆的箝制下，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至今充其量仍僅止於雛形階段。對此，本文從社會團體、網際網路和媒體輿論的發展現狀，提出以下兩個觀察指標：

一、登記有案之社會團體發展現狀：

社會團體是介於個人、家庭與國家之間，處在社會結構中的公共活動組織的一環，一般而言，社會團體的發達與否，因為關乎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社會自主運動的質量、以及個人和群體意識的實踐，因此，學界經常將其作為界定一個國家內部多元化、自由化、甚至民主化的標準，在本文中，則把它視為建構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必要條件之一。

根據表 3-4 顯示，九〇年代至今，中國大陸屬於全國性質的社團組織數量增長逾一倍，省級社團些微下降，縣級社團則增加約百分之二十，就總數而言是成長的。值得注意的是，各類社團數目在 1997 年均有所下降，原因在於中共國務院在該年開始實施社團清理整頓工作，共註銷非法、違規社團近一萬四千個，並在 1998 年修訂《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頒佈《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強化對社會團體的審批管理體制。

與其他國家相較，若以每人參加社會團體的數量而言，中國大陸是相當低的。學者霍華德（Marc Morje' Howard）曾經針對世界上國家，以「老牌民主」（Older-democratic）、後權威（Post-authoritarian）、後共產主義（Post-communist）為分類標準，探討在這三類國家中人民參與社會團體活動的頻率。他引述 World Values Survey 所做出的統計顯示，在老牌民主國家中，以美國每人參加 3.59 個社團為最高，日本則是每人參加 0.92 個社團最低；後權威國家中，南非每人參加 3.07 個最高，菲律賓每人參加 1.03 最低。即使是後共國家，馬其頓有 1.50 的水

²⁰ 孫曉莉，**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與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 11 月），頁 61-62。

準，最低則是保加利亞，每人參加社團數目為 0.35。²¹相形之下，若以中國大陸十二億五千萬人口，擁有近十五萬個社會團體，平均之後，則每個人參加團體數為 0.00012，只有保加利亞的萬分之三而已。

表 3-4 1991-2002 年中國大陸社團登記統計 (1991、1992、1997、2002)

年 份 \ 類 型	全國性質	省級	縣級
1991	836	—	116000
1992	1270	—	153000
1997	1846	21406	180000
2002	1712	20069	133000

註：2002 年另有登記「外國商會」15 個。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網站。 <http://www.mca.gov.cn>

此外，中國大陸學者認為，若論及有別於個人家庭與國家之間的公共領域，則大陸特有的居（村）委會組織，是不可忽略的一環。根據國務院民政部統計，至 2001 年止，中國大陸總計有居委會 9.2 萬個，村委會 70 萬個。²²而自 1989 年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屆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並頒佈了「居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規定了居委會是城鎮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後，城鎮居委會就扮演著「政府的腿」角色，對中共政策實施與落實，

²¹ Marc Morje'Howard, "The Weakness of Postcommunist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 No.1, January 2002, p.159.

²²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網站，<http://www.mca.gov.cn/news/news2002032501.html>。

產生很大的宣傳執行作用。²³

雖然人均參與社會團體的比率數字偏低，但九〇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社團數量增加，是個不爭的事實，這可以顯示大陸在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的建構上，有較諸以往不同的進展。惟此客觀現象的背後，仍有需要探索的深層結構因素。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中共領導人逐漸接受社會團體數量增長的事實，但他們仍然堅持社會不具自我組織與利益集結的自由，並且想要透過嚴苛的立法和組織網絡，強化黨和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易言之，這是中共所面臨的兩難之局：經濟快速成長支持著中共的生存，但也削弱了官僚政府的統治功能，這衍生了社會團體可能利用政府釋放出來的能量，製造社會抗爭事件而導致不穩定現象；另一方面，則是中共固有的列寧主義政黨傾向，使它對於任何黨以外組織的外在功能，都會進行嚴謹、甚至敵對的直接或間接控制。²⁴特別是與中共專政目標相違背者，一般都遭中共藉非法罪名予以壓制，例如法輪功、民運組織所擬創立的中國民主黨、甚至同性戀團體。²⁵可以這麼說，當前中國大陸依舊保持著「大政府，小社會」、「強國家，弱社會」形態，中共對社會團體的垂直行政控制與滲透監督機制不曾鬆懈，而社會活動、社會利益與社會理念的表達，也只有繼續在夾縫中尋找出路。

二、網際網路及輿論媒體的發展現狀：

網際網路的出現，為人類社會發展投下巨大變數，特別是網路所具有的特性：領域寬闊、傳輸快速、性質隱密，使得生活與溝通方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轉折。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的發展，要溯源至八〇年代初期，並在九〇年代中期以後進入較為廣泛應用階段，²⁶根據表 3-5 數據顯示，大陸內部註冊成立的網站，自 1997 年的 5100 個，快速增加到 2003 年 5 月的 23 萬餘個，成長了 46 倍；表 3-6 則針對使用電腦及上網人數作更細緻的統計，從 1997 年起，每半（一）年度的增長幅度，都在二位數以上，甚至出現百分之二、三百的增長率。當然，以大陸

²³ 孫曉莉認為，抓好社區建設是中國「政社分開」的一項重要內容，如何使城市中的居民委員會由「政府的腿」變成「百姓的嘴」，提高社會自身的自主性，增強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是中共面臨的一項重要課題。同註 15，頁 70。

²⁴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 March, pp. 126-128.

²⁵ *Ibid.*, p. 132.

²⁶ 有關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的發展軌跡，可參閱王占璽，**九〇年代中國大陸網際網路與社會發展**（台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民國 89 年 6 月），頁 52-54。

近六千萬網路人口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五的比率來看，並不算高，但由於使用網路族群多集中在大學程度、城市居民、平均年齡二十五歲、月收入一千元人民幣以上、習慣在家中自費或至「網吧」（即本地所稱之網路咖啡店）上網等現象，可說網路使用者基本上多為社會階層中的菁英份子，其所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就不可小覷。²⁷

網際網路除了提供群眾一條蒐尋資訊的快速便利管道外，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開闢公共言論的空間。以中國大陸最具指標性的人民網（www.people.com.cn，係「人民日報」所屬網站）為例，其所開設的「強國論壇」，由於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與「國務院國家安全部」全程監控，故其中所刊登之文章都事先經過審核過濾程序，惟其如此，該網域仍時見批評政府的論點。當然，這些論點都以不危及中共政權本質，而是牽涉行政缺失、社會亂象或主流意見為論述方向。這種官方網站所設立的公共討論空間，實際上就是一種宣洩社會怨憤、導引隱性逆流、甚至操作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變相手段。

另一方面，中共做為國家社會的管理者，也逐漸瞭解網路的現實重要性，甚至習於利用網路蒐集民情資訊，對此，官方媒體也刊載了若干擔憂的聲音。例如，新華網（www.xinhuanet.com，係新華社所屬網站）就曾轉載一篇署名文章，強調若是「領導」上網機率多，那麼網路管理者深怕網上內容有「出格」之處而冒犯上級，於是自定框架，讓網路缺乏生機；或者在網站中投領導所好，凡是領導喜歡的內容就多刊載，可能惹領導不快者就加以限制刪除；尤其是領導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根據個人的好惡對網上內容橫加干預，就更令人擔憂。²⁸

²⁷ 筆者同意王占璽君的觀點，即透過網路傳播與虛擬社區的交往，逐漸形成一種屬於「網民」特有的語言及互動方式，傳統的政治、社會菁英無法掌握這套溝通方式，逐漸喪失與網路菁英族群的對話和語言空間。相對的，網民身份的菁英能夠快速掌握資訊，對於傳統菁英所形塑的權威和價值體系，更容宜產生質疑觀點甚至加以挑戰，這對於以意識形態教條和社會化手段進行控制的中共而言，自然形成極大壓力。同前註，頁 77-78。

²⁸ 龔明義，〈領導愛上網該怎麼辦？〉原載「中國經濟時報」，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6/22/content_930989.htm。

表 3-5 1997-2003 年 5 月中國大陸註冊網站統計

網域 年份	com.cn	net.cn	org.cn	gov.cn	ac.cn	edu.cn	aadn.cn	合計計
1997	3009	408	102	357	306	357	561	5100
1998	13913	1223	409	982	432	531	906	18396
1999	38776	3753	940	2479	500	731	1516	48695
2000	96221	13291	2596	4615	682	1127	3567	122099
2001	99123	14045	2943	5864	673	1354	3317	127319
2002	133796	20234	9587	7796	1728	1629	4774	179544
2003 年 5 月止	115548	13291	6002	8746	687	1751	3019	236744

表格說明：

COM：工、商、金融企業

NET：資訊(NIC)和運行中心(NOC)

ORG：非盈利性的組織

GOV：政府部門

AC：科研機構

EDU：教育機構

AADN：行政區域

資料來源：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registration/tongji1.shtml>

表 3-6 1997-2002 年中國大陸上網人數、電腦數量統計

項 目 年(月)份	上網電腦數量 (逐年累計) 單位：萬台	增長率% (與前年度比較)	上網人數 (逐年累計) 單位：萬人	增長率% (與前年度比較)
1997.1	29.9	—	62	—
1998.7	54.2	81	117.5	89
1999.7	146	169	400	240
2000.7	650	345	1690	322
2001.7	1002	54	2650	57
2002.7	1613	61	4580	73
2003.1	2083	29	5910	29

資料來源：中國網。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263486.htm

在傳播媒體部分，九〇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傳媒產量出現大幅度躍升，例如 1990 年出版的雜誌數量是 1978 年的六倍以上，而從 1990 年到 1999 年則又增長了 40%。電視台數量從 1983 年的 52 家增加到 1990 年的 509 家，至 1999 年更增至 943 家。²⁹許多軟性新聞（如體育、名人趣聞、生活方式和時尚休閒）的報導，受歡迎程度遠勝於扮演官方喉舌的機關報紙或電台的新聞內容，加上某些「邊緣性」報刊甘冒政治風險，往往發表與當局相違背的政治評論，這些發展雖然不能證明一個自主性的公共領域已在中國大陸出現，但仍有助於多推動多樣化的公共言論。³⁰

²⁹ Ran Wei, "China's Television in the Era of Marketisation," *Television in Contemporary Asia*, ed. David French and Michael Richar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 327

³⁰ 麥康勉 (Barrett McCormick), 「中國媒體商業化與公共領域變遷」, *二 一世紀* (2003 年 6 月號), 頁 30-31。

因此，儘管中國大陸網路社會正不斷擴充，網路對於意見匯集與表達的功能也逐漸增加，但受限於中共對於意識形態機制的控管，目前欲使網路和輿論媒體成為公開自由的公共討論領域的目標還很漫長。例如，在 1996 年通過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中共針對新聞媒體的任務即明白表示：「新聞宣傳必須堅持黨性原則，…黨報、黨刊、國家通訊社和電台、電視台要發揮主導作用。要加強熱點問題引導和輿論監督，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³¹

按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觀點，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存在著互相適應的關係，當國家結構動搖時，一種較為健康的市民社會結構就會因應產生。³²此外，國家應該扮演一種教化者的角色，因著經濟力量發生作用而要重行組織、發展經濟生產機制的同時，亦不能任由上層建築自然發展。³³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則拒絕了市民社會概念，更強調由教會、學校、家庭、法律、政黨、工會、傳媒、文化事業等所組成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受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中介作用，將公私領域進行全面的霸佔。³⁴換言之，由執政者所掌握的國家機器，在制約上層建築結構，尤其是攸關政權穩定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組織時，理將採取較為積極、甚或嚴格的立場。而依照中共的思維，中國市民社會的進展，應該要從歷史出發，從中探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良好互動關係，因為這二者之間時常處於同構、互融的狀態，他們也深信，當前中國社會要產生公共領域以對抗國家的可能性並不高。³⁵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即認為，八〇年代末期的自由化浪潮，使得中國內部自然產生的商業組織、企業家、非正式社會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市民社會迅速再生。中共領導階層雖然知道與其固守馬克思主義教條，不如扮演中國現代化和改革的推動角色，更能保護自己的正當性，但是中國的知識菁英仍舊不滿足中共的

³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3月），頁386。

³²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238.

³³ *ibid.*, p.247.

³⁴ 林琳文，**後社會主義中國：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11月），頁145-146。

³⁵ 楊念群，「近代中國史學研究中的『市民社會』」，張靜主編，**國家與社會**（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頁211-212。另見 Dingxin Zhao, "China's Prolonged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Future: Same Political System, Different Policies and Method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28, 2001, pp.427-444.

偏頗改革：允許一定範圍內的經濟自由，但政治自由一概不承認。³⁶因此，即使江澤民在「十六大」中強調「健全基層自治組織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開辦事制度，保證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³⁷看似中共理解並要開展公共領域，但其最核心的考量，仍是從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詮釋角度出發，「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³⁸當然，黨的領導還是首要。

第二節 國家統治基礎與能力： 黨、國家、社會的互動關係

改革開放，這個由上而下的路線選擇，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纛支撐下，為中國的國家、社會帶來極大變化，同時也深受自下而上的反作用力激盪。當中共暫時度過 1989 年的政治危機後，深化改革的號角頓時再度吹起，江澤民在「十四大」上就明白表示，九〇年代改革和建設的重要任務，就是：「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最根本的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加快改革開放，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³⁹

事實上，中共所面對的改革開放氛圍，是一個兩難的格局：一方面要從其中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即使無法一步到位，也要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另一方面，則是如何利用政策調適途徑，承受無可避免的資源支出同時降低特殊集團所原享的利益。這個兩難問題的解決，著落在政治菁英與國家制度兩個樞紐上，更精確地說，在中共本身。原因何在？第一，政府官員在調和國際與本國之間的經濟互動方面，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第二，由於政治菁英在決策過程中佔有獨大地位，使得國家這個行為者有權在政策選項上進行取捨。第三、包含國家在內的政治制度，既會影響政府的行為能力，也會干預社會利益代表者的程度與範圍。

³⁶ 法蘭西斯·福山著，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1月），頁41-42。

³⁷ 同註4。

³⁸ 同前註。

³⁹ 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頁17

⁴⁰因此，當我們觀察或論述中共的國家統治能力基礎時，將黨、國家、社會這三個環環相扣的主體，進行辯證性的共同對待與區別劃分，是較為妥切的作法；當然，三者之間的融合性遠大於分割性，尤其是在強調黨國體制、以黨領政、「一定要準確把握當代中國社會前進的脈搏」⁴¹的中共政權下，更是如此。

「黨國體制」是中共素以依賴作為維繫政權的結構法則之一，依照大陸學者的解讀，所謂黨國體制應是黨與國家政權乃不同政治實體之間的政治領導關係，二者性質不同，但絕非互不相干，黨負責領導國家政權職能，而國家政權機制則主導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職能。⁴²觀照在意識形態與綱領層次，目前中共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一個指標說明，它包括了國體與政體的統一；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其他黨派、團體共同參與國家管理的統一；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的統一；民主和法治的統一。⁴³「十六大」上，中共又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框架內，加入了原有物質和精神文明以外的新說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具體而言，中共自認對國家、社會的領導，可根據「十六大」通過的最新修正黨章內容明白顯現：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堅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積極支援人民當家作主，切實保障人民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權利。廣開言路，建立健全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制度和程式。加強國家立法和法律實施工作，使國家各項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軌道。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

⁴⁰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Adjustment," in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ed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8.

⁴¹ 同註 4。

⁴² 見馮秋婷等主編，**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探析**（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7月），頁17。另學者亦指出，中共之所以採行黨國體制，源於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後，不得不面對內部被推翻階級（指國民黨政府）的拼命反抗和外部敵對勢力（指美國）的顛覆封鎖，所以必須實行高度集權的國家體制，以應付局勢，穩定社會。但這個歷史選擇，如今越來越成為束縛中共進行改革的框框。李錦坤主編，**經驗與啟示**（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6月），頁190。

⁴³ 包心鑒，「中國新時期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經驗和基本規律」，楊海蛟主編，**新中國政治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7月），頁287-288。

保持社會長期穩定。依法堅決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危害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犯罪活動和犯罪分子。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⁴⁴

這種「面面俱到」的論述，乃中共慣用的政治語彙，把黨當作一個無所不在、具備趨近全般功能的領導結構，就是一種全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即前述吳國光教授所言對社會生活全面而嚴格的控制。問題在於，中共真的擁有這樣的控制能力，而且控制得宜？從「十四大」到「十六大」，江澤民都以極短篇幅、一語帶過地將中共所面臨的施政困境進行簡單描述（見表 3-7），看似黨在對國家、社會統治能力和基礎上，收效要比失誤多，但是中共「國家長期戰略研究小組」成員王紹光等人卻認為，現在的中國面臨著兩種「怪象」（Paradoxes）：一是「中國怪象」（The China Paradox），指改革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但全國從上到下都感到面臨著重重危機。另一是「中國政治怪象」（The Paradox of Chinese Politics），指一方面民眾抱怨政府太強，管得太多、太死，另一方面卻又抱怨政府太弱，很多是該管而沒管（例如懲治腐敗、打擊製假販假、防止災難事故、從嚴執法），往往顯得無能為力。⁴⁵

這種管與不管、治與亂之間的矛盾，很大程度的原因是出現在改革開放之後，黨的核心意識形態的堅持，和黨政重疊所造成的官僚體制僵化，無法因應社會發展或變遷所帶來的轉換效應。鄧小平言「發展是硬道理」，江澤民說「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但在「政左經右」的發展邏輯下，黨的領導、甚至改革，遠遠落後於市場機制發展與社會階層分化的速度，特別是社會主義所強調的合理分配法則，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似乎已經被日趨強烈、且在黨權力卵翼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所掩蓋，造成了更大的社會鴻溝與國家裂縫：差距與不公平現象。大陸學者邱澤奇即認為，以「政企不分」為例，1998年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中，有63%來自於黨組織領導下的企業幹部，杭州私營企業主中有1/3是共產黨員。邱教授據此推論，如果權力和暴力仍然是財富獲得的主要來源時，就很難想像知識和創新能力做為中產階級的成長資本可以得到社會制

⁴⁴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2-11/18/content_633225.htm。

⁴⁵ 王紹光、胡鞍鋼、周建明，「第二代改革戰略：積極推進國家制度建設」，*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頁93。

表 3-7 「十四大」至「十六大」政治報告有關施政困境之論述

十 四 大	十 五 大	十 六 大
<p>回顧十四年走過的道路，我們在工作中也發生過失誤和偏差，現在還面臨著很多困難和問題，人民群眾還有不少意見和一些不滿意的地方。</p>	<p>國民經濟整體素質效益不高，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矛盾仍然比較突出，特別是部分國有企業活力不強；黨風、政風、社會風氣和社會治安的狀況人民群眾還不滿意，貪污腐化、奢侈浪費等現象仍在蔓延滋長，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弄虛作假的問題較為嚴重；收入分配關係尚未理順，地區發展差距還明顯存在，城鄉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人口增長、經濟發展給資源和環境帶來巨大的壓力。</p>	<p>農民和城鎮部分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失業人員增多，有些群眾的生活還很困難；收入分配關係尚未理順；市場經濟秩序有待繼續整頓和規範；有些地方社會治安狀況不好；一些黨員領導幹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和弄虛作假、鋪張浪費行為相當嚴重；有些腐敗現象仍然突出；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有的黨組織軟弱渙散。</p>

資料來源：

1. 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頁9。
2.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頁8。
3.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39.htm

度的鼓勵，這樣的「無所適從」，可謂是中國社會的「制度失衡」。⁴⁶亦有人認為，狹義的政治權力有兩種特徵，一是政治權力與國家職位緊密相聯繫，二是政治權力與利益緊密相聯繫；在市場經濟所帶來經濟結構與利益結構多元化狀態的複雜環境下，中國內部的部分掌權者，就運用了手中權力介入經濟生活，以權力為依托進行商品經濟活動。⁴⁷

吳國光則以「生機勃勃，秩序混亂」來形容改革開放後中共所治理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他認為，中國的經濟自由化與社會轉型過程中，正在發生一種內在的制度變遷現象，即使中共具備了全權控制的意識機制，但這種全權國家的角色、地位與作用正在下降。由於社會階層與個人的活力正隨著經濟市場化而逐步釋放出來，國家的作用範圍相對在減小，使得「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重複論證，因為中共這種列寧主義式政黨所掌控的「超國家職能」逐步解體，而出現了新意，即國家沒有能力做的事，也不允許社會來做；國家還有能力做的事，僅在於限制市民社會組織的發展。⁴⁸

中共沒有看到這種失衡？還是忽視了經濟社會轉變中關於國家治理能力的悖論？答案應該是否定的。然而中共更為關注者，是如何在這種鴻溝裂縫擴大的同時，找尋一種可以自我圓說的理論依據。

東亞模式，是一種選擇。

所謂東亞模式，廣義而言就是新加坡模式或新加坡經驗，其特點是具有良好的社會秩序、提倡儒家倫理、以及強有力的集權統治。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社會轉變，因為分配與社會正義問題無法得到有效解決，使得社會出現若干浮動現象，尤其是治安的惡化。採取東亞模式，則可以透過國家強有力的治理，對社會進行一定程度的壓制，特別是這個模式為中共提供了一條整體發展的捷徑，既可避開敏感的政治改革禁區，亦有利於塑造執政衰敗下的片面合法性；當然，還可以在自由主義角度下為相對獨立於權威體制的自由市場經濟提供辯護基礎。⁴⁹

⁴⁶ 邱澤奇，**中國大陸社會分層狀況的變化（1949-1998）**（台北：大屯出版社，民國89年9月），頁130。

⁴⁷ 同註43，頁284。

⁴⁸ 吳國光，**自由的民族與民族的自由**（台北：大屯出版社，民國91年12月），頁37-39。

⁴⁹ 祖治國，**90年代中國大陸的新保守主義**（台北：致良出版社，民國87年11月），頁112-117。

國家主義，是另一個途徑。

所謂國家主義，是東亞模式對於新保守主義的重要影響產物，與國家統治能力關係密切。在這裡，國家除了是真正的單一結構外，更具有政治權力與形而上影響力，足以左右其下轄結構存在與否的一種論述。在這個前提下，國家是一個相對於社會的自由實體，具備汲取能力與意識形態結構，掌握了政策決定權，對於內部空間組織、時序安排、功能分化等均產生高度影響。⁵⁰當把這種「國家中心論」與政經改革相連結時，國家組織就會被賦予成一種改革者的形象，任何新的調適轉變，端賴國家官僚扮演類似企業經營者般的靈活程度而定。⁵¹

因此，國家主義著重者，在於對國家能力現實狀況的觀察，是否能夠為中共政權的穩定起到一定的評估作用，至少，是警示作用。王紹光、胡鞍鋼在 1993 年出版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是一個典型的範例。王、胡以量化評估方式，將中國的國家能力區分為汲取能力 (Extractive Capacity)、調控能力 (Steering Capacity)、合法化能力 (Legitimation Capacity)、與強制能力 (Coercive Capacity)。依其研究結果，改革開放以來的放權讓利，已經使得中共中央在汲取（尤其是財政汲取）能力上出現大幅削減的趨勢，加上經濟波動、國有企業負擔、壞帳問題等引發宏觀調控能力下降，進而導致體制不健全而產生的社會再分配不彰現象，使得中央政府面臨普遍性的信用危機，合法化能力衰退，當然也就衝擊了中共半世紀來賴以維繫政權的強制統治能力。⁵²

吳國光以消極 (Passive)、積極 (Active)、超 (Super) 國家職能三種評估指標認為：在超國家職能方面，因為經濟發展、社會生活活躍，導致部分政治自由化的政治發展路徑，明顯可見中共國家能力出現機制衰退現象。積極職能部分，經濟發展的良好表現支撐了中共在此領域的力量，但是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如對於下崗職工）的落後，則影響了積極層面的效果，連帶凸顯中共政府無法提供無形的公共財 (Public Goods)，亦即消極職能也未見起色。⁵³

⁵⁰ Timothy Mitchell, "The Limits of State : Beyond Statist Approaches and Their Critics ,"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Issue 1, March., 1991, pp.94-95.

⁵¹ 同註 40。

⁵²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27-125。

⁵³ 同註 48，頁 42-45。

筆者以為，實際上江澤民所統治的中國，應該較為趨近於統合主義（Coporatism）所描繪的狀態。這必須從其「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下的政治體制改革談起。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首度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說法，⁵⁴開啟了中共在改革開放年代有關政治統治方法、原則與藍圖變革的序幕。有關中共政治改革的內容，鄧小平認為應該包括肅清封建遺毒、黨政分開、權力下放、進行機構改革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擴大民主、加強法治建設，⁵⁵總體目標有三：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⁵⁶落實在評價標準上，鄧小平舉出三個關鍵議題：一、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二、看能否增進人民團結、改善人民生活；三、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⁵⁷鄧小平的概念出發點，在於文化大革命衝擊了中共的權威，破壞黨內的運作準則與政治文化，甚至導致中共領導的合法性瀕臨危機。因此，鄧主張應該要積極從制度主義角度，重建黨的權威，尤其是對國家、社會的領導效能，這個思維，指引著中共在八〇年代之後的政治運作方向。例如，鄧在提到重建黨權威時，強調以民主集中制為基礎的列寧主義式先鋒隊政黨的運作方向，⁵⁸特別注重中共的經濟開放，不代表黨員與組織能夠具備相對自主的資格，更不可能因此而造成「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現象，弱化了黨的絕對權威與黨員在意識形態上的純粹性、積極性。從鄧的一系列談話，可資佐證：

●「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權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沒有這一條，就是亂哄哄，各行其是，怎麼行呢？」⁵⁹

●「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⁶⁰

⁵⁴ 鄧小平，「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頁39。

⁵⁵ 許耀桐，「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展及啟示」，同註43，頁227。

⁵⁶ 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同註54，頁178。

⁵⁷ 鄧小平，「怎樣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同註54，頁213。

⁵⁸ 李英明，「鄧小平、劉少奇與毛澤東：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本質」，**東亞季刊**，民國84年冬季號（第27卷第3期），頁3~4。

⁵⁹ 鄧小平，「中央要有權威」，同註54，頁277。

⁶⁰ 鄧小平，「壓倒一切的是穩定」，同註54，頁284。

●「我們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總之，中國人的事中國人自己辦，中國不能出亂，這個道理要反覆講，放開講。」⁶¹

●「要得到發展，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對內改革，包括上層建築領域的政治體制的改革。」⁶²

●「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對於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這次就要處理。」⁶³

●「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黨有黨紀，國有國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為什麼要有一條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只有人民內部的民主，而沒有對破壞份子的專政，社會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現代化搞成功。」⁶⁴

至於江澤民，則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出發，欲進一步深化社會穩定與政治體制改革的辯證關係。江指出，「任何時候都決不能動搖、削弱和丟掉這些制度，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只有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才能保持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⁶⁵他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決不是削弱和淡化黨的領導，甚至以損害、敗壞黨的領導為代價，把黨當作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障礙。⁶⁶「十六大」政治報告載明：「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⁶⁷，其中「領導」和「動員」兩個詞彙，就可以清楚地表明中共在「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上的基本立場。是故，中共為了避免政治體制改革衝擊權威，影響意識型態合法基礎，始終在鄧小平理論的基礎上，持續強調民主集中制與四個堅持的核心地位，且不忘情於列寧主義菁英的幹部領導模式。

因此，投射在對國家、社會的領導上，中共依舊堅持中央集權化的法則，並

⁶¹ 鄧小平，「中國不允許亂」，同註 54，頁 286。

⁶² 鄧小平，「加強四項基本原則教育，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同註 54，頁 202。

⁶³ 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同註 54，頁 196。

⁶⁴ 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同註 54，頁 154。

⁶⁵ 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中全會召開二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 6 月），頁 686-687。

⁶⁶ 同註 55，頁 237。

⁶⁷ 同註 4。

開始重視治理效能 (Efficiency of Govern)，但卻逐漸無法抵擋地方與社會團體分權的現實。根據李侃如的研究，其樂觀地認為，中共的官僚體制並非鐵板一塊，即使中央政府強調權力集中，但其對於地方官僚，尤其是利益集團的掌控能力卻日趨薄弱，這種走向鬆動的管理模式，為中共因著政治改革而可突破舊體制缺口，提供了有力的實現條件。⁶⁸謝淑麗 (Susan Shirk) 則採取迥異的論調認為，政府各部門與地方機構、利益集團參與改革過程誠然重要，但由於中國的改革是建立在與地方和利益集團的妥協基礎上，各種利益集團在其中不斷汲取利益，這致使改革雖有成效，卻推延了改革進程中棘手問題的解決，導致重大問題積重難返的現象。⁶⁹

戴慕珍 (Jean Oi) 從另一角度，提出「扈從」的概念。在扈從的前提下，中共擁有了「經濟與物質的壟斷與分配權」，這既有利於其針對黨群關係與幹部政策，進行合乎核心意念的操作控制外，更重要者，是賦予了中共作為唯一（但已非全面）權力擁有者的社會意義。⁷⁰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 採取趨近於戴慕珍的觀點，提出所謂「組織性的依賴」(Organized Dependence) 概念。魏氏指出，組織性依賴結構是中共統治的權威基礎，中共雖然掌握經濟控制權，但隨著對外開放、權力分殊、企業與財政改革等連串措施，弱化了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約束力量，改變官僚對黨國體制的依附，讓人民可以從黨國機器以外的其他管道去獲得生活所需與職業謀取，這就扭轉了過去幹部與人民對黨國全面依附的狀態。⁷¹

戴慕珍與魏昂德的研究，帶有很濃厚的統合主義色彩。其後，安德佳 (Jonathan Unger) 與陳佩華 (Anita Chan) 更進一步地採用統合主義觀點，認為中共的統治模式是在科層官僚或社會結構內，指定某一集團做為利益代表，這一被指定的集團必須同時負責去管控其所代表的單位機構，使其所從事的任何活動必須符合中

⁶⁸ Kenneth G. Lieberthal,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Kenneth G. Lieberthal & David M. Lampton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30.

⁶⁹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s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21-40。另見周雪光，「西方社會學關於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研究狀況述評」，涂肇慶、林益民等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香港：牛津出版社，1999年），頁152。

⁷⁰ 相關論述請參考 Jean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⁷¹ Andrew G. Walder, "The Quite Revolution from within: Economic Reform as a Source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Andrew G. Walder, ed., *The Waging of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1~24.

共期待的意向。⁷²這種二元性的統合主義模式，提供了中共黨內政治運作的合理空間。換言之，在國家所設定的框架下，官僚組織與民間社會可能擁有相對的「自主性」，這種國家與社會關係並非傳統集權主義下的零和或宰制關係，而是一種「鑲嵌」型態的從屬關係，例如個體勞動者協會（SELA）、私營企業協會（PEA）、工商聯合會（ICF）等，多為中共所授意成立者，既無法獨立於黨的控制之外，還要扮演一定的「利益輸送帶」角色。而由中共官員與紅色資本家為主體結構的「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即「全國工商聯」，前主席為「十五屆」政治局常委尉建行，現任主席為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兆國，）則與中共、「全國政協」關係密切。

過去半世紀中共所依賴者，應是得力於全權主義對國家社會生活的多面向掌控及滲入，加上黨機器中的組織系統、統戰系統對地方官僚及社會團體所採取的高密度管理。依照統合主義的操作邏輯，中央集權模式是會導致社會各階層群體在行為上的同步性，由於其受到中央政策的直接影響，攸關個人利益分配權益，使其行為上經常表現出與中央相適應的一致性。⁷³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中央計畫經濟效能並不若前蘇聯、東歐共黨國家般嚴密，許多投資權、財政控制權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⁷⁴此除了弱化中央計劃的控制外，具體的影響來自於經濟利益的地方化、社會新興階層的興起與社會團體發展、⁷⁵尋租現象與幹部腐敗情形發生、國家能力下降等。特別要注意的是，即使前述市民社會僅止於雛形生成階段，但不可忽視推動體制外組織化力量的成長壯大，包括地下型組織，例如胡石根領導的「中國自由民主黨」；公開的行動組織，如王有才欲建立的「中國民主黨」；或者一些非政治化組織如「自然之友」；更有舉世著名、被中共定位為邪教組織的「法輪功」等。⁷⁶姑且不論這些社會組織的政治能量有多大，但其

⁷² 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an,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 Model,"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5, No. 33, pp. 29-53.

⁷³ 周雪光，中央集權的代價，吳國光編，**國家、市場與社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85。

⁷⁴ 羅小朋，「等級產權制與中國的改革」，同前註，頁52。

⁷⁵ 相關論述可見 Jonathan Unger, "Bridges: Private Busin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New Associ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996, No. 147, pp. 795-819;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 (March), pp. 124-141; , Kristen Parris, "Th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Interests," in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Ed. by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99), pp. 262-282, Davis Goodman,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pp. 241-261 等文。

⁷⁶ 陳小平，「代中國憲政主義的興起及其面臨的主要問題」，**中國事務季刊**（第6期，民國90年10月），

所代表社會與中共統治力量對比關係的轉變，正是中共黨國體制在意識形態合法性、組織結構、權威行使、政治效忠等可能造成解構效應的危機所在。

第三節 中共作為「執政黨」的政權合法性挑戰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共所面臨最大的政權挑戰。雖然在鄧小平授意下以戒嚴和調集軍隊方式，對抗爭群眾進行武力鎮壓而平息動亂，但在中共的辭典裡，改革開放必須是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進行，當個人或群體以反體制、反權威為出發點，採取足以威脅中共所謂的國家和社會穩定，實際是衝擊中共政權基礎的途徑，那麼所有「與人民站在一起」的政治語言，將頓時化為控制與壓迫手段的護身符。江澤民在「十四大」上強調：「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黨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平息在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繼續前進」。⁷⁷又說「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必須鞏固和發展團結穩定的政治局面。沒有政治穩定，社會動盪不安，什麼改革開放，什麼經濟建設，統統搞不成。」⁷⁸質言之，中共任何的施政目標，都是為了維繫政權，但在政權運作的實質意義上，中共還在積極尋找足以支撐其永續執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基礎。⁷⁹

所謂合法性，即指某個政權、政權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些方面是合法的，⁸⁰亦即對統治權力的承認。合法性概念試圖從證明政治權力與服從性存在的方式，解決政治學上的基本問題：統治權利與政治義務。⁸¹更精確地說，合法性是強調政治有效統治的必要基礎，是治者與被治者的共識理念，根據社會主導價值體系的判斷，由民眾給予社會支持及認可統治的合理正當性，包括了統治方式、有效範

頁 38-39。

⁷⁷ 同註 39，頁 8。

⁷⁸ 同前註，頁 15。

⁷⁹ 國內亦有譯著將此譯為「正當性」，認為合法性應係 lawfulness 而非 legitimacy。見方長梧主編，**唐山社會科學簡明辭典（政治學）**（台北：唐山出版社，民國 77 年 11 月），頁 90。

⁸⁰ 戴維·米勒 (David Miller)、韋農·波格丹諾 (Vernon Bogdanor) 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年 6 月），頁 410。

⁸¹ Jean-Marc Coicaud, *Le 'gitimite' et Politique*, 佟心平等譯，**合法性與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年 5 月），頁 12。

圍、權力基礎與來源。⁸²政治社會學巨擘韋伯 (Max Webber)，就曾針對合法性概念提出三種著名的分析基礎：傳統 (Traditional)、個人魅力 (Charisma)、與法治理性 (Legal-Rational)。⁸³而針對共黨國家的合法性研究，霍姆斯 (Leslie Holmes) 則更為詳盡地做出兩組命題，各有十一、七個觀察指標。⁸⁴

李英明教授認為，中共的合法性有兩大支柱，即黨的組織和統制性經濟體制。所謂黨的組織，是指黨內的激勵機制和黨的一致性；統制性經濟體制則是用來提供黨內激勵機制和為黨內一致性的工具和現實基礎。⁸⁵亦有論者認為中共合法性基礎來自於經濟成長、意識形態、以及「霍布斯式」政權。⁸⁶觀諸中共建政後歷史，儘管曾因大躍進、反右鬥爭、文革等事件，暴露出政策急轉、領導人威信驟減，以及黨對國家控制能力弱化的危機，但並未因此大幅撼動中共統治權力。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三月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論述，中共隨後將其載明於「八二憲法」中，可謂真正以法理現實穩固了中共的執政地位，即使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造成了嚴重影響，中共尚且安然無恙。究其主因，除了中共所慣用的社會控制與宣傳機器發揮關鍵影響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共在意

⁸² 王浦劬主編，**政治學基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162-165。

⁸³ 同註79。

⁸⁴ Holmes 的研究分為兩組命題，第一組：(一) 合法性是相當模糊概念，關係到規範性價值和信念。(二) 合法過程是經由養成的，在某種時空內會成為社會的支配模式。(三) 除了內部合法化外，也有一些外部合法化模式，只是較不明顯。(四) 任一特定秩序之合法化之程度是變異的。(五) 合法性包括民眾對政權和系統的態度反應，以及領導者和行政人員的信念程度。(六) 社會上不同團體在不同的合法化模型基礎上，給予系統和政權其擁有合法性的程度。(七) 在武力高壓和合法化基礎上，領導者與行政人員會予以選擇。(八) 為求社會穩定，低合法性會採取政治高壓手段，結果不是被認可、就是被威脅，或者形成某種社會契約。(九) 涉及系統合法性的危機，關係到對於控制百姓的權力操作。(十) 一個系統或政權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同時處於嚴重合法性危機中，而不消失滅亡。(十一) 在危機之中，如果有一個新的且穩定的系統可以被制定出來，那麼這個較完善系統就可以被提出，反之，遲早會形成新的危機。第二組命題為：(一) 共產主義國家是動態的，大部分從權力轉化到企圖爭取民眾之合法化。(二) 在合法化過程中，許多國家的幸福感 (eudaemonic) 合法化，已成為一種重要支配模式。(三) 幸福感模型會對領導階級的統治產生懷疑。(四) 領導階級本身必須在對行政人員或對民眾的兩者合法化之間作一選擇，以克服幸福感合法化問題。(五) 雖然問題 (或危機) 會使領導者走向合法化之途，但也會有風險的出現。(六) 危機在短、中期間不會發生，如果某些措施是用來弱化或改變行政人員，變化轉向於法治理性模型，則經濟改革會更加成功。(七) 就長期而言，幸福感合法化是不適宜的，壓力也會因走向法治理性合法化後再次出現。Holmes 歸納指出，共產黨員為了解決合法化的矛盾，會採取兩種牽涉到危機的解決方法：(一) 企圖遠離法治理性模型，寧可走向其他合法化模式。(二) 走向完全法治理性，放棄馬列主義教義，亦即共產黨的特殊權力將完全消失。Leslie Holmes, *The End of Communist power*, 宋鎮照、張保民譯，**共產政權之末路**（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84年10月），頁49-56。

⁸⁵ 李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頁93。

⁸⁶ 所謂「霍布斯式」政權合法性，係指大陸社會害怕萬一中共垮台，因為沒有可替代的執政團體，可能導致經濟與社會的全面混亂而失序，連最基本的正常社會秩序都無法維持，經濟面臨倒退，國家安全遭到威脅，因此維持中共政權是一不得已的選擇。徐斯儉，「『十六大』政治情勢研判」，**展望2003年兩岸政經發展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2月），頁17-18。

識形態核心領導權的逐漸流失，鄧小平與其支持者瞭解到，必須依賴為人民提供經濟益處的能力，改採促進提高經濟生產力與政治控制的雙軌運作，才持續維繫其統治於不墜。⁸⁷

江澤民主政後，曾一度欲走上政治緊縮優先、經濟改革置後的路線，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強調「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⁸⁸的指示下，江不得不切實奉行。事實上，中共最在意者，還是在於透過經濟建設與體制改革達成政治穩定，確保黨在權力上壟斷的目標，⁸⁹在兩個文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的前提下，西方學者即認為鄧小平倡導的「兩條腿走路」，在江澤民手中就變成了「胡蘿蔔與棒子」政策。⁹⁰尤其是經濟發展成果促使綜合國力增長，更使中共自恃以此作為政權合法性基礎的思維愈形鞏固，⁹¹例如，觀察九〇年代以來三屆全國人大會議，由國務院總理（李鵬與朱鎔基）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段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字句不曾改變，便可證明此言不虛。⁹²

在歌功頌德與自我肯定聲中，中共還是保有部分自我警醒與批判的能力，特別是在政權合法性的挑戰部分。一九九二年，江澤民首次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

⁸⁷ Tony Saich, "Discos and Dictatorship: Party-State and 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見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1994 年第 4 期) 頁 107。

⁸⁸ 鄧小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講話要點〉, **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 頁 375。

⁸⁹ Lucian W. Pye, "Jiang Zemin's Style of Rule: Go For Stability, Monopolize Power And Settle For Limited Effectiveness," *The China Journal*, No.45, January, 2001, pp.45-46.

⁹⁰ Willy Wo-Lap Lam, "Stability at the expense of reform?" *China Brief*, Volume 2. Issue 8, April 11, 2002, p.2

⁹¹ 吳玉山教授即認為,「現代化理論 (modernization paradigm) 最重要的命題便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會帶來政治的開放和民主化。如此看來中國大陸由經濟改革所帶來的高速成長將會促成政治改革。然而另外一個關於政治變遷的經濟社會理論--政治穩定理論 (regime stability theory) --卻認為在威權體制下所產生的高速經濟發展會鞏固威權統治, 壓抑民主力量。以中國大陸的例子來看, 政治穩定論認為成功的經濟改革會替代政治改革, 持續提供中國共產黨政權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同註 9。

⁹² 1993 年 8 屆人大, 李鵬表示「在這五年中, 我國經濟蓬勃發展, 社會不斷進步, 綜合國力進一步增強... 過去的五年, 是我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的五年。」見 **人民網** <http://www.peopledaily.com.cn/item/lianghui/zlhb/rd/8jie/newfiles/a1360.html>。1998 年 9 屆人大, 李鵬言「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以來的五年, 我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解放思想, 開拓進取, 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經濟體制改革邁出決定性步伐, 對外開放提高到新的水平。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人民網**, <http://www.peopledaily.com.cn/item/lianghui/zlhb/rd/9jie/newfiles/a1200.html>。2003 年 10 屆人大, 朱鎔基言「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團結奮進, 頑強拼搏, 戰勝種種困難, 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我們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 開始向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人民網**, <http://www.npcnews.com.cn/gb/paper403/1/class040300002/hwz232591.htm>。

份在「十四大」上進行政治報告，有關中共政權的評價，江表示：「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不僅能夠領導革命取得勝利，而起能夠領導改革和建設取得勝利。任何懷疑、削弱、否定黨的執政地位和領導作用的觀點與作法，都是根本錯誤和十分有害的。」⁹³爾後，江先在「十五大上」，強調「全黨要按照新的偉大工程的總目標，從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全面加強黨的建設，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不斷增強拒腐防變的能力。」⁹⁴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提出：「必須始終自覺地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鬥力，……進一步解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⁹⁵的說法，最後在「十六大」上，以四個「一定要」，為中共當前政權挑戰的回應面向，提出總結性的論述。⁹⁶

從上述江澤民的重要講話中，我們可以發現九〇年代以來中共對於政權所遭遇挑戰的回應態度與方向，有了明顯轉變，從「十四大」僅提「執政地位」，至「十五大」論及「領導與執政水平」，並提出「拒腐防變能力」，終至「十六大」復加進「三個代表」與「抵禦風險」的觀念。中共雖未明確提出「執政合法性危機」的說詞，但確已逐漸意會到執政地位出現動搖的徵兆，必須謹慎處理。

合法性危機挑戰的出現原因很多，大陸學者對此的認知相當深刻，也較外界的研究成果更具臨場感與現實性。例如：

吳國光認為，較諸前蘇聯和東歐，中國的單軌市場化最為成功，但其問題在於，因為缺少相應的政治制度建設，導致國營企業效益低下，政府官員嚴重腐敗，社會不同群組和地區之間貧富懸殊急遽拉大，由於沒有法治權威而引發整個社會陷於失序現象，種種社會不滿不僅在增加，而且在積聚。⁹⁷

⁹³ 同註 39，頁 38。

⁹⁴ 同註 3，頁 46。

⁹⁵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論三個代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8 月），頁 152。

⁹⁶ 江澤民在「十六大」政治報告中，針對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部分，提出「一定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時代發展的要求；一定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進一步解決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一定要準確把握當代中國社會前進的脈搏，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領導體制和工作制度，使黨的工作充滿活力；一定要把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既立足於做好經常性工作，又抓緊解決存在的突出問題。」同註 4。

⁹⁷ 吳國光，**逐鹿 五大**（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 年 6 月），頁 60。

胡鞍鋼認為：「腐敗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污染，它不僅造成各種經濟損失，而且還構成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合法性的嚴重挑戰，引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極大關注和憂慮。」⁹⁸

康曉光、皖河等則指出，政治腐敗、經濟風險以及社會不平等，既威脅經濟發展，也與人民要求的政治清明和社會公正相衝突；而菁英聯盟對大眾的過份剝奪，加劇社會兩極分化，驅使大眾鋌而走險，這都給中國帶來了威脅政治穩定的因素。⁹⁹

黃仁宗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沒有解決、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兩極化趨勢明顯、市場失序、地區發展差距過大、黨政企不分、腐敗尋租突出、法治空泛化、社會受挫感增加等，在在都是大陸社會的隱憂問題，更使中共的改革有「滑入地獄」的可能。¹⁰⁰

孫立平表示，二十年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由於強勢集團主導政改路徑所造成的兩極分化和腐敗，如果不能得到及時修正，就會使得中共現有政權出現合法性危機。¹⁰¹

蕭功秦則提出，因為日益嚴重的「軟政權化」（指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行政命令貫徹能力的退化、行政實施效率的低下和法律規則被任意破壞）、「貧富兩極化」與「分利集團化」（指在市場發展與體制轉型過程中，運用某種特殊政、經勢力與資源，以非市場化方式獲取更大的財富和權力，筆者註：類似權貴資本主義），以及「游離態」（既脫離原有生存結構，又無法被新的生存結構吸納的社會成員，如盲流、下崗職工）的社會動員程度急遽增長，都是大陸社會如今面臨的「發展綜合症」。¹⁰²

甚至在「人民日報」頭版，也有針對共黨政官員辭官「下海」經商造成腐敗現象的批判報導，提醒中共應該重視。該報導指出：

⁹⁸ 胡鞍鋼，「腐敗：中國最大的社會污染」，見胡鞍鋼主編，**中國：挑戰腐敗**（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頁35。

⁹⁹ 康曉光，「未來10年中國政治發展策略探討」，**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1期），頁73。皖河，「利益集團、改革、路徑與合法性問題」，**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2期），頁2-3。

¹⁰⁰ 黃仁宗，「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關」，**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2期），頁72。

¹⁰¹ 孫立平，「我們在開始面對一個斷裂的社會？」，**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2期），頁5。

¹⁰² 同註2，頁145-147。

「我們的黨政官員手中的權力，是有著相當的『含金量』。按說，當官也好，從商也罷，只是不同的社會分工而已，『沒有高下之分』。但事實上，由於體制和機制的原因，我們社會之中的『官權』即黨政權力，很多時候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政策變更、專案審批、資金使用，如此等等，可說是『一章（公章）值萬金』的。由此，便有可能滋生權錢交易、官商勾結之事，便有可能產生賄賂和腐敗。這些年的反腐鬥爭也充分證實了這一點。」¹⁰³

一項大陸學者採擷西方政治學界對共黨國家所製作的危機指數，值得一提（見表 3-8、3-9）。學者總計提出十個觀察指標，每項指數由 0 至 3 分表列，總評則區別為三個等級：沒有危機、存在危機、存在嚴重危機。根據大陸學者的綜合評斷，中共的總和分數為 19 分，恰巧處於危機與嚴重危機之間，而這些危及政權穩定的因素有增長趨勢，對中共而言並不樂觀。¹⁰⁴

¹⁰³ 孫月沐，「辭官下海又成熱點，應防「權力期權」謀私利」，**人民網**，2003 年 7 月 10 日，<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shizheng/1026/1961490.html>。

¹⁰⁴ 彭明，**第四座豐碑**（香港：明報出版社，1998 年 4 月），頁 106-107。

表 3-8 中共危機指數表

項 目	分 數
社會主義已喪失對人民群眾的吸引力	2
社會上對發展前景存在悲觀情緒	2
生活水平不斷下降	2
共產黨士氣低落	3
宗教活動日趨活躍	1
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發生抵觸	2
私有化勢頭猛烈	3
政治反對派在社會上積極活動	1
自下而上地公開要求政治多元化	2
在人權問題上政府採取守勢	1
總分	19

資料來源：彭明，**第四座豐碑**（香港：明報出版社，1998年4月）

表 3-9 中共危機指數換算標準

分項選項	分項分數	總和分數	代表意義
很對	3	10分以下	沒有危機
對	2	10-19分	存在危機
基本對	1	19分以上	存在嚴重危機
不對	0		

資料來源：彭明，**第四座豐碑**（香港：明報出版社，1998年4月）

綜合上述論點，顯見中共所面臨的合法性挑戰面向林林總總，政、經、社領域均有涉及，而官員風紀墮落與社會腐敗，「官倒」、「吃皇糧」的情形比比皆是，可謂各方共同的想法。據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曾在 2002 年針對 102 個地廳級領導幹部學員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中層幹部最為關心的問題，首推政治體制改革、機構人事改革，而若需要突破政改使其有成效，幹部群依序選擇了「處理好黨政關係」、「擴大黨內民主」、「轉換行政機構職能」、「改善決策機制」、「嚴格推行幹部任期制」等途徑；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問及有關社會形勢嚴重問題時，有兩成學員認為是「腐敗」，居所有問題之首。¹⁰⁵ 本文即以腐敗為例探究對中共政權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依照胡鞍鋼的研究，中國大陸腐敗類型可分為四種：

一、尋租性腐敗：指為獲取純粹轉移所花費的稀缺資源，以及壟斷、管制關稅和其他相關制度所帶來的傳統損失。

二、地下經濟腐敗：指未向政府申報和納稅，政府未能控制管理，其產值和收入未能納入國民生產總值的所有經濟活動。

三、稅收流失性腐敗：指違反公平競爭的各種合法性稅收減免，海關、稅務等部門官員通過賄賂、收買、勾結、分贓等方式引起的海關稅收和其他稅收流失。

四、公共投資與公共支出性腐敗：指涉及政府出資或援助的公共投資中的腐敗，包括國有經濟投資、政府採購合同、其他公共支出、以及政府資助機構（如學校、醫院）等的腐敗。¹⁰⁶

吳敬璉則認為中國的腐敗可從經濟源頭觀察，包括利用行政權力對市場活動進行干預謀取私利；利用轉軌時期財產關係調整和變化時機，將公共財產列為己有；利用市場體制的不完善、不規範牟取暴利。而這三類腐敗活動，都與權力息息相關。¹⁰⁷ 從表 3-10 中可見，自 1995 至 1999 年間，各種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概估高達人民幣一兆元左右，換言之，有近七分之一的 GDP 產值被腐敗現象所吞噬。

¹⁰⁵ 中國時報，民國 91 年 2 月 6 日。

¹⁰⁶ 同註 98，頁 39-44。

¹⁰⁷ 吳敬璉，「中國腐敗的治理」，**戰略與管理**（2003 年第 2 期），頁 1。

表 3-10 中國大陸腐敗情形造成經濟流失概估

腐敗類型	經濟損失（人民幣，億元）	占 GDP 比重（%）
各類稅收流失	5700-6800	7.6-9.1
國有經濟投資和財政支出 流失	2575-3410	3.4-4.5
非法經濟	300-340	0.4-0.5
壟斷行業	1300-2020	1.7-2.7
合計	9875-12570	13.1-16.8

註：樣本期：1995-1998/1999 年，GDP 依 75000 億元人民幣計算

資料來源：胡鞍鋼主編，**中國：挑戰腐敗**（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 月），頁 61。

對於政權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人民而言，經濟上的損失或許感受不深，但是黨政官員的違法亂紀、表裡不一，就可能讓民眾在心理上產生排斥甚至激憤的反效果。以中共官方的統計數據看，至 2000 年 11 月止，中共全國紀檢機關審決案件 134692 件，給予黨紀處分 136161 人，公檢法系統所查處的案件中，包括貪污、賄賂、瀆職等案由，遭起訴、判決、撤銷黨職者由縣級幹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在列。¹⁰⁸學者認為，腐敗的滋生蔓延，嚴重損害中共「執政黨」的公眾形象，加劇社會矛盾，更逐漸蠶食黨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礎。¹⁰⁹

面對這種情勢，中共理當產生危機意識，在更廣泛的民意與公眾監督上，找

¹⁰⁸ 光明日報，2001 年 1 月 14 日。

¹⁰⁹ 王孝鳴、黃衛平，「論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報告（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1 月），頁 13。

到新的合法性基礎。¹¹⁰江澤民在「十六大」政治報告中即指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不堅決懲治腐敗，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就會受到嚴重損害，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

¹¹¹江澤民以如此嚴厲的語氣，表達了中共對於腐敗現象給黨帶來政權衝擊的隱憂，那麼，中共在實際作為上如何回應？

杭亭頓在「第三波」一書中，歸納了威權體制面臨合法性剝落時的五種選擇回應方式：

一、直接拒絕承認其合法性受到削弱，並希望或相信他們能夠將權力保持下去。

二、用愈見殘酷的鎮壓、強制的服從，取代日益渙散的合法性義務而生存。

三、挑起國外衝突，訴諸民族主義恢復合法性。

四、為政權裝扮若干民主外表，例如開放並操縱選舉。

五、領導人毅然決然地主動結束權威統治。¹¹²

從杭亭頓的歸納看，中共應該還是處於第一種狀態，而且未能找到一條既能和平過渡到公開、競爭型的政體，又能保持中共領導地位的安全之路。這條路難以尋找，否則中共內部應該會有相當程度的支持力量選擇此途，眼前中共只得通過其他途徑——保持經濟高度增長、鼓吹民族主義——來尋求民間社會較為廣泛的支持。¹¹³這樣的主流思維，在九〇年代各項重要會議、講話、或決議中隨處可見，例如一九九四年，中共在「十四屆四中全會」上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即表明，「我們正面臨著難得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進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機遇，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將有力地推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再上新的台階，從而保證我國能夠取得更加主動的地位，勝利地跨入二十一世紀。」¹¹⁴可以這麼說，中共在政權維繫的課題方面，是要建立

¹¹⁰ Zbigniew Brzezinski, "Disruption without Disintegr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9, No.1, 1998, p.5.

¹¹¹ 同註 4。

¹¹²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第三波*，劉軍寧譯（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85 年 11 月），頁 59-61。

¹¹³ 同註 2，頁 244。

¹¹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3 月），頁 303。

在一個不被質疑的合法性與明確政策目標的基礎上，¹¹⁵ 但是立基於經改的合法性未見得穩定，因為這還牽涉到官方意識形態是否繼續適用、官僚腐敗、決策品質能否符合實際需求等多方面輔助。¹¹⁶

前中共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潘岳，於 2001 年發表一篇「對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文章，震動了海內外，也突顯出中共目前侈言是「執政黨」的諸多疑點。潘在文內指出，由於西方的遏制、大陸加入世貿組織、以及內部的政治、社會不穩定因素挑戰，使中共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具有緊迫性。革命黨奉行鬥爭哲學，代表特定階級，直接干預國家事務，信奉特定意識形態。執政黨主張和平穩定，力求平衡社會各階層利益，透過民主立法實現主張，依法辦事。而目前中共的政治績效遠遠未完成，還有一系列理論與實踐的問題要解決，包括黨的政治定位、執政合法性、黨政與黨企分開、社會基礎等，至於「三個代表」的理論內涵與實質影響，則是中共要解決的另一難題。但令人不解的是，潘在強調改革的同時，卻仍堅持五個原則，即一黨執政下的黨內民主，不搞多黨制；堅持共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不搞三權分立；加強新聞輿論監督，但不搞新聞自由；進行軍隊現代化，但不搞軍隊國家化；堅持人大制度，不搞全民普選。

117

潘岳一文，點出了中共在許多層面仍停留在以革命黨的理念治國，並未如中共所倡言的「與時俱進」；另一方面也標示了中共高、中級領導階層的固有心態：無法拋卻權力誘因，只要在結構內進行不對基本體質造成翻轉的浮面式改革。江澤民在 2002 年 5 月 31 日於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發表著名的「五三一講話」，強調「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必須高度重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中共看到了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價值，看到了國家現代化發展的必要性；江亦表示「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對於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黨執政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¹¹⁸，顯示中共也體認到其以群眾運動起家的本領，正出現微妙的質變。有大陸學者這麼認

¹¹⁵ 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Political System*(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 p.437.

¹¹⁶ Frederick C. Teiwes,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45,2001,p.77-82.

¹¹⁷ 聯合報，民國 90 年 7 月 5 日。

¹¹⁸ 人民網，<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shizheng/16/20020531/742159.html>。

為：要使自己保持足夠的合法性，獲得來自民眾源源不斷支持，執政黨就必須想方設法建立一種制度，這種制度能較好地體現執政黨與民眾之間代表與被代表的關係，既能保證政黨對整個政治體制的控制，又能保證民意得到順暢的表達。¹¹⁹

制度來自於權力擁有者中心思想的展現，當中共「想方設法」的提出各種理論、制度，要使其執政合法性獲得近乎安全的保障，外在客觀環境固然有催化作用，但是中共的主觀認知才可能具有舉足輕重的效果。或許是因為統戰策略奏效、自信可以獲得廣大群眾的支持，使得中共在核心意識形態中總是排斥多元政治體系的存在，也不願放權讓利給人民。¹²⁰當中共看到近十餘年來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政黨相繼失去政權後，總認為那是它們不能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辯證關係，忽視社會公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導致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才會逐漸失去民心，使執政基礎動搖。¹²¹弔詭的是，這些清楚的認知，正是目前中共執政合法性挑戰的主要根源。

¹¹⁹ 王長江、姜躍等著，**現代政黨執政方式比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頁550。

¹²⁰ Gabriel A. Almond and G. Bingham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8), p.416.

¹²¹ 令計畫，「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鄭治等編，**六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頁434。